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

正如共產主義的思想，未在中國生根，「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是短促得很。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狂瀾，振盪了中國一部份的知識份子，便有幾個大學教授和寫作家開始接受了共產思想，在當時出版的幾種刊物上以文字宣傳共產主義。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等在上海發起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一九二〇年，該會接受第三國際的援助，一九二一年七月，又接受第三國際的指示，正式組織中國共產黨，成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自此以後的二十餘年中，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是不斷的受着國際的援助和指示的。

中國共產黨所揭櫫的標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他不主張用議會的方式，民主的方式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

一

式爭取政權，而是要用暴力奪取政權，因此特別重視武力。毛澤東於一九四一年在「共產黨人」的創刊號上曾經坦白承認中國共產黨的生長與發展以及將來的取得政權都是依仗於武力和必須繼續依仗於武力的，所以認定「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

在一九二二年的時候，中國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的根據地雖尚在廣東一隅，但國民黨員之分佈於各省者則已達八十萬人以上，而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却爲數甚少。是年六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即決定「中國共產黨必須參加民族運動，並贊助國民黨推翻帝國主義，以實現民主聯合戰線」。一九二三年一月，第三國際派越飛至中國，向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正式提出「容共要求」，經過相當時期的談判，才得到孫先生的同意，由孫先生與越飛在上海發表聯合宣言，其中涉及容共的部分共有兩點：

一、「孫逸仙先生認爲共黨組織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以

使此項制度成功之情況，越飛對於此點完全承認」。

二、「孫逸仙先生認中國最緊要問題爲完成統一，取得完全獨立自由；越飛承認蘇聯對此能熱烈的作實際的幫助」。

此項聯合宣言發表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在廣東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第三國際的指示，決定由中共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中共黨員乃陸續申請加入，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即決定三項原則，予以容納，此三項原則爲：

一、中共黨員非以個人資格不得加入國民黨。

二、申明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

三、加入國民黨之中共黨員須誓行三民主義，放棄共產黨主義。

國民黨實行容共以後，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加入國民黨之中共黨員被選國民黨中央委員者，執行委員中有李大釗林祖涵等八人，候補執行委員會中有毛澤東等二人，監察委員中有高語罕等三人，中央常務委員九人中，中共黨

員佔三人。中央組織部部長譚平山，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組織，宣傳，青年，工人，農民，海外，商民，婦女等部之秘書楊匏安，沈雁冰，黃日葵，馮菊增，羅綺園，許甦魂，黃樂裕，葛季鷹等，均爲中共黨員之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者。此外，國民黨的省市縣各級黨部中，政府機關中，和軍隊尤其是軍隊的政治部中，也有不少的身中共的黨員參加。國民黨對之一律推誠相見，並無歧視，當時的「容共」，可以說是名符其實。

中共的一部分黨員雖然加入國民黨，但中國共產黨則依然存在，並曾祕密作「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指示中共黨員，謂：

「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建立強大的羣衆及其共產黨的基礎」。

所以當時國民黨所辦的各種訓練機關，如政治講習班，農民運動講習班，及婦女運

動講習班等，都有加入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在內，取得重要的地位，積極的爲中共發展黨員。他們這種辦法，確也得相當的成果，據中共在一九二七年提出的報告中稱，自加入國民黨後，三年之中，中共黨員已由三百人擴展爲八千人。

中共又利用加入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把國民黨中的工人農民及知識份子階級的急進份子結成左派，宣傳國民黨中的官僚政客資本家爲右派，而指摘右派份子在廣東和大商人買辦階級及地主合作的錯誤傾向」，（引自一九二五年中共出版的黨內讀物「黨員須知」），這樣在國民黨內製造成派別，使其互相水火，以便利中共對之實行吸收利用和各個擊破。同時中共更百般設法遮斷國民黨與民衆的關係，藉以削弱國民黨的力量。

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從廣東出師北伐，中共竭力反對，其以文字發表者，如陳獨秀刊載於「響導周報」上之「論北伐」一文，即其一例。反對無效，北伐毅然出師，節節推進，直抵武漢，中共指使其參加在北伐軍內的黨員，盡量隔絕北伐軍與人民結合的道路，並煽動後方兵工廠罷工，停止軍火的生產和供給，企圖使北伐不得長足進展。同時

他們又在北伐軍佔領的區域內發動工人罷工，農民罷租，店員罷業，擴大工人武裝（名曰糾察隊）和農民武裝（名曰自衛軍），並將工會農民變成政權機關，檢察行人，自由逮捕，設堂審訊，拷打禁閉，壞法亂紀，社會爲之騷然。

國民黨於北伐軍底定贛閩以後，原擬定將中央政府及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暫駐南昌，中共黨員另提主張，力爭政府必須遷往武漢，並利用國民黨內的人事摩擦，造成甯漢分裂的局面。當時武漢的政局幾乎完全在中共的把持之下，國民黨在武漢的重要幹部，有的被利用，有的被驅逐，更有遭了殺害的。是時中共又決定了六項祕密議案，其要點爲：

- 一、「關於土地革命，不用政府命令，從下級人民自動沒收做起」。
- 二、「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增加新領袖，代替國民黨的原有委員」。
- 三、「改變現在國民黨的組織」。
- 四、「消滅國民黨中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加上從兩湖挑選的五萬工農

份子，組織新軍隊」。

五、「以知名的共產黨員作領袖，組織革命法庭，處罰反動軍官」。

六、「工農軍隊士兵的土地不沒收」。

國民黨已經切實明瞭中國共產黨是在步步的與國民黨爭取領導權，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的寄生狀態是於國民黨的前途有害無益的，乃於一九二七年實行清黨，想將掛名國民黨籍的中共黨員——一部份是原爲中共黨員而加入國民黨者，一部份是中共在國民黨內吸收的黨員——逐出於國民黨之外，並約束其越軌的行爲，藉此鞏固黨的基礎，安定後方秩序，以便繼續進行北伐。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相當數量的武裝工農，北伐軍內，政工人員多屬中共黨員，即軍官之中，中共黨員亦爲數不少，各級政府內也有很多的中共黨員，其力量已不可輕視；國民黨的清黨運動所以不能以和平出之，而終於成一種非常變動者，原因即在於此。

中共反對清黨，不肯令其黨員退出，乃發生南昌暴動，旋即失敗；又在廣州發生暴

動，並組織蘇維埃政府，未久亦歸失敗；乃又在南湖製造秋收暴動，從此中共遂走上了處處暴動時時暴動的道路，殺人放火，習爲常事，此種行爲名曰「肅反」。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中央蘇維埃區中央局通過的「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中說，此種肅反，「依靠肉刑」「苦打成招，以殺人爲兒戲」，「特別嚴重的是不分首從，尤其是不分工農份子，一律同樣處置」，其殘酷情形可以想見。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除決定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府，及擴大紅軍外，並決議已有的「蘇維埃須不斷擴大自己的領土；一、以武力進取；二、竭力幫助鄰區武裝暴動」。所謂「竭力幫助」，「即蘇維埃政府更應派遣代表往鄰區去準備和組織該區內的政權核心和暴動」。此外並主張以「游擊戰爭爲主要鬥爭方式」將「游擊戰爭發展到地方暴動」。又認定「革命動力只是工農」，須實行「工農獨裁」，所以燒殺之禍有加無已。

中共的「暴動」、「游擊」，和「肅反」，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止，遭受到

破壞的有十八省共二百數十縣之多，計江西五十九縣，湖北四十縣，湖南二十九縣，安徽十八縣，福建二十三縣，廣東十八縣，河南七縣，江蘇九縣，浙江八縣，廣西十二縣，陝西二十餘縣，河北七縣，四川，雲南，貴州，西康，青海，甘肅諸省各數縣至十數縣不等。其中破壞最甚者首推江西，後來紅軍退走後，申報及大公報皆曾派記者前往調查，除在報端發表外，並曾出版「贛皖湘鄂視察記」，詳述各該地區燒殺之慘狀。

當中共在各地積極進行蘇維埃運動的期間，日本即於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二年先後攻東北四省並在上海發動戰事，造成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在淞滬抗日之戰進行方酣之際，中共的紅軍在江西猛攻贛州；在國民政府派兵增援長城各口努力與日軍對抗的時候，紅軍在江西猛攻撫州，威脅南昌。國民黨當時在日本和中共的內外夾攻之中，確在應付上遭遇到不少的艱難。

一九三四年，中共的軍事和政治的力量開始敗退，最後集中於陝甘寧邊境，因為邊境荒寒，倉卒之間，不能再進行土地革命，且實力日減，局勢益迫，乃不能不採取新的

策略。這種策略，中共稱之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具體內容爲暫時與國民黨妥協，藉以免除國民黨方面更進一步的軍事壓迫，然後利用抗日的機會漸圖中共力量的發展。中共乃於一九三五年發出「八一宣言」，開始承認他的暴動和蘇維埃運動的錯誤，要求國民黨停止對於他的進攻。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舉行第五屆中央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對中共問題曾有根絕赤禍決議案，其要旨爲：

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澈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二、政權統一爲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故必須澈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

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爲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

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四、階級鬥爭以階級之利益爲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自相讎殺，故必出之於奪取民衆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爲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國民黨提出此四項辦法後，中共卽表示完全接受，遂於同年九月二十二日，以宣言方式提出四項諾言，其要點爲：

一、「承認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中共）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的統一」。

四、「取消紅軍的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

轉，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國民黨對於此項宣言當即表示歡迎，蔣委員長於同年九月二十四日代表中國國民黨發表談話，以表明此種態度，談話中云，「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爲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危急存亡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應當使全國人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對於國內任何派別，祇要誠心救

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政府無不開誠接納」。

中共採取此種策略，一方面減少了國民黨後顧之憂，增加抗日的力量，同時也解救了中共本身的重大的危機，所以毛澤東說：「要是當時沒有統一戰線策略的運用，求得停戰休息的機會，中國共產黨已不再會有今日」。中共黨員林毓英在他所著的「中國共產黨底策略路線」一書中也說：「在革命情緒低落及力量縮小的現在的時候，只有抗日才能保存實力，才能擴大實力。」因爲「抗日可以得到國人的同情，可以分散與和緩敵人（按：即指國民黨）的進攻。在這個條件下可以爭取廣大的羣衆，可以擴大紅軍，可

以進行加緊黨的組織。」可惜他又說：「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是改番號，不是改編，紅軍的獨立性仍是保存的。不但如此，而且更能擴大與鞏固。蘇維埃暫時取消，改爲特區政府，實質的本性是未變的。用實質政府，不特不能削弱無產階級政權的力量，更能達到廣大羣衆革命力量之發展」。這樣一來，中共四項諾言內最重要的第三第四兩項簡直等於零了！所以國社黨的張君勱曾致函毛澤東，勸其交還軍政於中央毛亦置之不答。

中共參加抗日的目的既然是在「擴大紅軍」，所以搜繳人民私有或地方公有的槍枝，誘編友軍的部隊，和乘機襲擊友軍……等等的「不幸事實時有所聞：每佔領或自友軍手中奪得一個地區的時候，即從事組織變相的蘇維埃政權，並稱之爲「地方抗日政權」或「民選抗日政府」。所有原來在十八集團軍（即改編後之紅軍）佔領地區負責抗戰的部隊，如控制冀中的鹿鍾麟、朱懷冰、高樹勛、張蔭梧等部，在山東作戰的于學忠、沈鴻烈等部，在山西作戰的閻錫山所部，在江蘇作戰的韓德勤所部，均曾迭遭十八集團軍所屬部隊的襲擊和壓迫，受到莫大的損失，除了閻錫山所部還留在山西境內艱苦掙扎

以外，其餘上述各部隊均已經不堪壓迫，損失奇重，退出了原駐防區。因此中共現在的軍隊確已較改編時增加了若干倍，變相的蘇維埃政權也比原來擴大並且增加了若干倍。

在前段所述的情形之下，中國的整個抗戰工作確乎平地裏增加了不少的困難。屬於中共武力的「新四軍」，因為不服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被國民政府予以解散，並取消其番號，中共遂公開的對國民黨進行文字上和口頭上的「宣傳戰」。自此，在盟邦人士的心目中，乃逐漸意識到有所謂「目前的國共問題」而集中其注意於此項問題之如何獲得解決。

國民黨方面，也極願早日解決這個問題，並為避免走入極端，乃一再正式宣言，決意用政治的和平的方式來解決此問題。一九四四年五月，政府代表張治中王世杰與中共代表林祖涵在西安先作初步洽商，以後林祖涵至渝，商談仍在繼續的進行。去年九月十五日張治中及林祖涵，曾分別在國民參政會正式報告商談進行的經過，所有有關文件，並經彙印發表，一切詳情均經各報詳載不必再行復述，總之其商談結果，尚有若干距離

未達到接近的程度，即單以關於軍事的一項問題而言，一九四三年中共曾派師長林彪至渝，要求政府將中共的軍隊編爲四軍十二師；張治中王世杰林祖涵在西安洽商後由林祖涵簽名提出之要求中，仍照林彪所提出四軍十二師之數；政府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表示，准編爲四個軍，十個師；中共以後又提出意見書，內云：「……應請政府對中共軍隊編爲十六個軍，四十七師，每師一萬人，爲委曲求全計，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即此可以窺見中共重視武力和依仗武力的基本心理。何況林祖涵在國民參政會口頭報告的時候，又突然提出「召開國是會議」和「組織聯合政府」兩項，是年九月二十日，延安的中共中央又提出要求「改組統帥部」之口號，並表示必須由中共參與政權軍權，始能解決此項懸案；十一月周恩來由延安至渝，復攜來「組織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及「分配盟方援華物資於中共所有之軍隊」等條件，益發使商談的進行不得不陷於遲緩。是後經過幾度商談，政府表示可以讓中共人員參加政府機構與軍事委員會，由周恩來回延安商議。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又由延安飛渝，堅持上次之條

件不能改變，並又提出「召開黨派會議作爲國是會議的預備會議」之新要求。經半月之磋商，政府即具體提出若干重要讓步，其要項如左：

一、承認中國共產黨爲合法政黨。

二、在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容納中國共產黨高級人員。

三、在行政院內設政務會議，容納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政黨代表。

四、組織三人委員會，內有政府代表及中共代表各一人，餘一人商請美軍方面派定，共同籌商改編中共現有軍隊及其給養之供應等問題。

但是中共方面認爲除却組織聯合政府之外其他任何條件都不能接受。對於中共所提「召開黨派會議」的要求，政府表示可以召開這種會議，由中國國民黨的代表，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其他各黨各派的領袖，及無黨無派的一部份人士出席，共同商討國民大會開會以前關於政治及軍事團結的過度辦法。周恩來表示擬回延安徵求意見，並在臨行以前，於二月十四日發表一篇書面聲明，公開表示對於政府所作的各項讓步加以拒絕。